

李仲凡 聂发堂 主编



回忆录

(第一辑)

湖南省党史联络组联合办公室编

编辑说明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为了给深入开展党史学习和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素材，我们在省委党史委、省党史联络组联合办公室的指导下，将老同志不辞劳苦撰写的许多有价值的回忆文章汇编成《回忆录》（若干集），以此作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献礼并激励积极撰稿的同志们。

《回忆录》第一集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料，也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内容；有个人或集体写作的文章，也有当时的日记、工作总结和会议报告。这些资料，在不影响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我们在文字上作了个别订正。对其中的原始资料，只改正了个别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全部保持了原汤原味。

《回忆录》得以迅速与读者见面，得到了赵培义、李哲、康政和党史委王中杰、龚固忠、欧阳楚龙等领导同志的指导和鼓励。同时，与党史委资料室周仁秀积极提供史料，联络处张文良、周日美、易琦等同志在抄写和校对方面做的大量工作，也是分不开的。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本书刊用的材料，我们来不及做深入细致的核实工作，因此个别情节上难免有出入，希望阅者提出意见，以帮助补充和修正。我们也希望全体老同志都行动起来，撰写出更多更好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

1990年12月1日

(三)

建国初期双峰县几项主要工作的回忆与体会

..... 康 政 (214)

进入绥宁 开创工作

录 目

——回忆1950年10月绥宁解放的前前后后

..... (一)

徐敬民 (259)

利用降匪 侦捕匪首

王建奎 (266)

涟源县反动会道门“宗研社”覆灭记

王冀克 (278)

两起案件的侦破经过

张孟栋 (282)

战场、课堂、温甜的家

(18)——永难忘怀在湘北建设学院的岁月

齐育英 (287)

(70)——

王东才 (312)

叹英雄壮志未酬战死沙场慰忠烈青史永垂英名流芳

(81)——回忆东坪“二八”惨案

王俊臣、曾广成、宋兰臣、刘云桥 (302)

对我省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变革的回忆

王东才 (312)

回顾与展望

(191)——写在湖南电视台成立二十周年

李青田 (317)

.....

附 录

南下行军记述

赵培义 (323)

李政委在中共宁乡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328)

.....

.....

(701) 月如高, 愁如深, 斗如寒

.....

.....

(081) 其 意 张 静 一 陆 人 军 制 用 大 三 录

访问何长工同志记录

一九七七年十月廿八日下午，十一月四日上午和五日晚，我们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何长工同志。现将他三次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你们要我谈的内容很广泛，题目多。加之我们正在分校，工作很紧张。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大家都辛苦点，有一天多时间就可以讲清楚。

一、赴法勤工俭学

一九一七年冬天，我正在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念书，离毕业还有一个学期，我就发愁了，因为当时毕业就是失业。没有一个年轻人不为自己的出路感到恐慌，尤其是我这样的家庭，能够出门读书已经不是容易的事情，若是失业在家，那就更没有办法了，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小学的老师，又是世交的罗喜闻，从广东带回来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找到一个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可以借路费，还可以开法文班先学法文。怕我们不信，他还拿出几份留法勤工俭学的章程给我们看。

罗喜闻这次去广州，原是我们打听到南洋谋生的门路，门路没有找到，却发现一个机器厂办事处的门口贴着这样一份章程，上面还写着负责人的名字，他进去打听，才知道负责人黄强就是工厂的厂长，工厂在城外，他跑到城外，找了两次，

也没有找到，又写信去，隔两天黄强到饭店找他来了。并告诉他：你们是湖南人，不懂广东话，在这里筹款不方便，不如到北京，那里也可以想法借路费，伙食也比这里低。黄强给了他几份章程，并且写信介绍他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授李石曾接头。罗喜闻就拿着章程和介绍信回到湖南来了。

寒假过去了，罗喜闻被我们几个年轻人逼不过，只得硬着头皮到北京去闯一闯。他这一去就没有信息，直到夏天，才得到他的信，叫我们去。这时，我正满十八岁，刚从甲种工业学校毕业。这一下，可得救了。我和高风、毛羽顺等六七人，马上动身去北京。到北京后，罗喜闻热情地把我们安插在内府街，这里原来是五个人住三间小房子，现在加上我六七个人挤在一起，真是热闹。大家都是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的，在我们来以前，罗喜闻他们已经在北京大学学法文了。

我们到北京来的时候，湖南先后来了四五十人，其中有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等。

毛泽东是从北京大学杨怀中教授那里得到勤工俭学的消息的。得到消息后，他就组织了新民学会的一批会员赶了来，很多人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也有教师，后来成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骨干。这些人不满意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都想推翻它，渴望接受新思想，改造社会，恰好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给大家指出一条路，这成了大家出国的动力。

那时，毛泽东住在杨怀中教授家里，晚上在客厅里搭铺，他住的地方离我们很近，他和蔡和森几乎每天都到我们这里来，商量勤工俭学的各种具体问题，研究那些官绅名流的话是否可靠，大家最关心的是出国的路费问题。罗喜闻在北京交涉了好久，找了好多湖南的大官，总得不到肯定的答复，眼看开不开班也成了问题，开了班，能不能走？谁出路费，更是问题。我们这些穷学生，哪有钱这样闲住下去？东想西想，蔡和

森又提起到南洋去做工，毛泽东赞成这个意见，但觉得困难更大。毛泽东又提议在北京就开始勤工俭学，免得坐吃山空，虚度光阴。罗喜闻把这个意见告诉了蔡元培，蔡元培也同意。后来还是他亲自出面，才接洽好了在长辛店铁路工厂举办。

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留法勤工俭学的预备班成立了，并在华法教育会（方家胡同）里面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蔡元培主持了这个会，他还特地邀请了一批湖南社会名流参加大会。会上他报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宗旨和发起湖南班经过以后，特别指出：希望湖南的社会人士帮助这班湖南学生，早日出国。当时就从到会的人中，推选了杨怀中、王文豹、王毅、胡子靖等人担任董事，负责把这班学生送出国去。会上讲话的人不少，杨怀中先生也讲了话，会后，报上发表了消息，这一来，各省的青年，都陆续赶来，于是分北京、保定、长辛店三处开班，湖南的六十个人，大部分分到保定，小部分分到北京和长辛店。当时毛泽东（后来没有出国）分到北京班，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等分到保定班。刘少奇也分在保定班，（后来没有出国）。蔡和森在那里一面学法文，一面教国文。我和罗喜闻、戴盖三、周爱资等，分到长辛店班。

三个预备班中，只有长辛店一班是半工半读，每月三元工资。这一班叫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工业科。同学们都羡慕这一班，分配到这一班的人也觉得挺幸运，因为这里不仅有生活费，而且做了工将来到法国还有一点技术资本。我自然也很高兴，我在湖南甲种工业学校虽然学了一些基本的书本知识，但还没有学到实际的生产知识，现在这儿上午做工，下午上课，晚上自习，能参加实际生产，学些真本事，就可以补足这缺陷。

我们在工厂实习，从头到尾，生产过程中的每个工种都轮次地学，从翻砂一直到最后的装配、检验。花工夫最多的是学

钳工，老师傅费了很多苦心来教我们，对我们都非常好。下午上课，教员都是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程师，他们多是留法或留比的学生，无论讲机械、几何、三角、代数……都用法文。他们都很热心，巴不得我们多学点东西出国去。所以，教的发狠的教，学的拼命的学，讲的也冒汗，听的也冒汗，我们一个钟头学五六十个生字，两个钟头就要学一百多，哪里能记得住？我搞了一个生字表，一百一百地记，一面做工，一面记生字，一面写中文，一面写法文，看中文，念法文，看法文念中文，上厕所念，走路也念，有的人半夜起来念，还是记不住。幸好不久保定育德中学法文班的20多个毕业生，也参加到这一班来了，他们有相当的法文基础，和我们混合编组，作我们的法文辅导，这样学习进度才快了一些。我们在工厂半工半读，穿上工人的衣服，和工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朝夕相处，思想感情也逐渐和工人接近了，都感到劳动的伟大。我们穷是穷，生活过得倒有意思，互助精神也好。有人病了，大家赶快请医生、煎药、还有人看护他。经济困难，互相捐助。有一种集体主义精神。至于日常杂务，都是自己做，洗衣、缝补、做饭、打扫卫生等等，各有专责。罗喜闻看起来像个书生，戴个眼镜，斯斯文文，可是却能跑路，钱用光了，多半是他进城去想办法，他成了我们的“外交官”。戴盖三又高又大，长得很魁梧，表面看来，有些冒冒失失，实际他倒是个细心人，针线活做得比谁都好，他还负责煮饭，而且煮得很好。一个姓段的同学管炒菜，周爱资管采购。我呢，没有什么专长，就做杂活，打扫房间、擦灯罩子、上灯油、糊窗子。我的工作很简单，跑腿就辛苦了。记得有一次，天上已经飞着雪花，大家还穿着夹衣，我们的“外交官”不得不进城去想办法，当时，我们吃的烧饼、菜饭，都是赊来的，穷得连买火车票的钱也凑不起来，他只得步

行到北京。但是大风大雪穿夹衣走路是会受冻的，于是我们有三四人就睡在床上，把衣都脱给他，一重重穿上，就这样，他一步一步地走到北京，借了钱回来，给我们每人缝一套棉衣。虽然如此，一有钱，我们就订了许多报纸、杂志，凡是北京的大小报和上海的有名报纸、刊物，只要是新的我们都有。长辛店邮局同志说：我们专门派一个跟你们送报纸、送东西。我们也真有宁可不吃饱，不能不读书的劲头。

正在这个时候，伟大的“五四”运动把我们卷进火热的斗争浪潮里去了。差不多两个月，根本没有上课，也没有做工，主要是搞宣传，打着长辛店救国宣传队的旗子，三五个人一组，到车间或下乡去作宣传工作，每天带上几个窝窝头，早出晚归，一天跑几十里路，到处向工人、农民演说，进行爱国宣传，劝老百姓抵制日货（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这里不详细谈了）。

欧战停止以后，各省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陆陆续续地走了好多人。大体上，凡是省政府有津贴的那些省份的学生，差不多都走了。也有少数人是私人筹路费走的。长辛店班育德中学转来的人，都几乎走光了，只剩下我们，路费问题没有解决。有一段时间，李富春和罗喜闻一起，天天为这个事急，毛泽东、蔡和森也经常为大家的事奔跑，他们还到过长辛店（毛泽东到长辛店的情况以后专门谈）研究的还是路费问题。

路费本来是不该成问题的，早在开班以前，蔡元培、李石曾就曾经让罗喜闻去找掌握湖南米盐公款的熊希龄解决这个问题，那时熊希龄曾表示过：如果欧战停了，将来湖南的六十个人出国，就由米盐公款的利息中拨出一笔作路费。可是到我们真正要动身的时候，他又舍不得了。大家等得着急，又找华法教育会，可是前边说过的，这些“热心人士”开开介绍信还可以，一遇到棘手的事就都往后缩，谁也不肯得罪人，所以我们只好各自回家想办法。

我们华容县的人，推举了高风、毛羽顺、周爱资、蔡子舟等八个人，回到县里去请求补助，我们日夜盼望回去的人，能带来好消息，谁知道他们不但没有得到补助，反而被县里关起来了。后来还是罗喜闻的腿长，他跑到岳阳，跟长沙和北京教育部拍了电报，又乘车到了长沙，向湖南省政府告了一状。华容县长见这势头，知道事情不妙，当下就把学生放了，并且请学生吃饭，放鞭炮，大家憋一肚子气走了，一场斗争的结果，仅仅得到了从华容到北京的路费，我们欠的债，还是罗喜闻带回钱来还的。

我们在长辛店学习期间，还有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就是毛泽东先后两次来到这里深入了解情况和指导我们的学习。第一次，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上旬的一个白天，他穿着灰布大棉衣，头发长得长长的，来到长辛店铁路工厂。他在工厂从生产细节到工厂范围；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水平，作了详尽的调查。同时，对长辛店留法预备班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指导。他住在我们班里，在厂里转完了，回到班里和我们一谈，我们就觉得虽然时间短，他掌握的情况，特别是职工的情况都非常详细。毛泽东对留法预备班虽作了详细的了解，但对长辛店扩大招收名额的企图没有达到，据说是工厂当局的顽固与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怀疑和采取冷淡态度所致。

毛泽东第二次到长辛店，记得是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个晚上，永定河的冰刚刚解冻，毛泽东先到铁路工人中间去活动过一番，然后回到我们班上来。我记得很清楚，他那天晚上坐在我的坑头上畅谈国家天下大势和应该怎样唤起工人，说这是救中国的路。还问我学法文，转舌学好了没有，对我很关怀，他对“进士”“翰林”这些词都懂得发音，发音很清楚，他要我们努力学习，因为到法国工厂里去做事不可能带翻译，一切都靠自己。当时对我们的学习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旅费问题，虽然经过许多波折，总算解决了。熊希龄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签名给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每人四百元光洋的路费。大家得到了旅费又拿得了毕业文凭，都很高兴，有的马上就走了，有的先回家去看了一趟，我也回家去了一趟，亲朋好友，这个三元，那个两元，又凑了六十元给我，我拿了这笔钱，离开了南北军阀正在混战的湖南到了上海，和罗喜闻、周爱资他们一块儿住在法租界的渔阳里等船，这里住了很多等船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沿途要扫雷，船只要运货、运军队，民用船很少，所以等船花了很多时间。在这期间，我们还学了世界语。

当时，上海还有另外的一个出国团体，叫“工读互助团”，那是去苏联的。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正在发展，我们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有几个人过去了，我也差点去了，后来我见着柯庆施、吴方，知道他们就是参加“工读互助团”到苏联去的。

十二月，华法教育会上海分会给我们办好了出国手续，我们乘法国邮船动身了。

这只船很大，上面有排球场、跳舞厅、餐厅，载了一百多个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其中有五六个女生，还有二三十个朝鲜人。中国驻法国的公使陈篆，也在这只船上，他带了姨太太和两个女儿，住在头等舱里，我们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都住四等舱，在船的下层，那里空气不流通，为了使睡觉的空气好一点，船过香港的时候，几乎每个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都买了一把折叠的帆布靠椅，大家把靠椅一排排地摆在甲板上睡觉。

航行了将近两个月，我们才到达了法国的马赛。这是七条航线汇集的地方，也是法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我们一到马赛，华法教育会就派人来接我们到巴黎去了。在我们来到的时候，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已经有三百多人了，一部分就在巴黎，一部分已经分散到外地。

当时法国的社会生活还没有恢复常轨，很多工厂在战后开不了工，因为大战期间，这些工厂都改为兵工厂，一时很难恢复正常生产。同时，也缺乏原料和资金，所以，法国工人失业很多，加上法郎贬值，社会生活很动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到了可怕的程度。加上我们初踏上生活之路，语言隔阂，生产知识有限，西欧各国政府，在大战的创伤下，对应付本国失业者就感到头痛。更不会优先照顾我们这一群有过激党嫌疑的、好闹事的外国青年。我们在法国的处境是很困难的，起初大半找不到工作，又没有钱进学校，许多学生就住在华法教育会里面，华法教育会每月给少许生活补助费，那时华法教育会的房子都住满了，还在花园里搭了帐篷住。

我们这一批人，刚到的时候，还有几个钱，因为四百块钱的路费，买船票只花七十元，剩下三百三十元，我兑成法郎，到法国就变六百六十元，生活不成问题，就到处游览，去观赏有趣的巴黎风光。

中国学生进学校，一般是要求到几个大城市——巴黎、里昂、马赛、波尔多等地。我怕在大城市把心搞花了，就要求到小城市去，到一个没有中国学生的学校去，跟法国人有更多接触的机会，好学法文，踏踏实实地读书。

我被分配到圣雪尔旺省的圣雪尔旺学校，这是一个教会学校，但校长却是个共产党员。在我到学校不久，法国社会党内部分裂了，一小撮右派贩卖工人阶级利益，投降了帝国主义，而绝大多数忠诚的革命者则正式加入了共产党，我们学校里也建立了党组织，我到这里学习，真是幸运。

我们的学校，在西部海边的诺曼底半岛上，离学校不远，有个圣罗马古城，附近有修船厂、铁路工厂。这个学校有二千多人，是综合性的中等技术学校，有些班次近乎高等专业性质，还附设了工厂。我一进去，就插到机械班。校长怕我赶不

上功课，特地指定成绩好的学生来帮助我。不久又来了一批中国学生，学校专为我们开了一个中国班，还给我们编了组。学校选最优秀的学生帮助我们，选最好的、最有经验的教员教我们。我们住的地方还是跟法国同学混合编在一起，同学们的关系都很好，每到星期天就到法国同学家里去作客。当时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半工半读，就是白天读书，晚上做工；一种是先工后读，就是先做半年或三个月工，积下一些钱，然后再进学校读几个月书；还有的身上有点钱，就先读书再做工。我做工和读书，都是交叉进行的。算起来做工的时间比读书的时间多。钱快用完了，暑假我回到巴黎做工。当时，很多工厂未恢复，正式工不容易，所以很多勤工俭学学生都做临时工，我也做临时工。法国人把临时工称作苦工。

我们什么工都做，半夜起来，到市场打杂，推菜蔬、送牛奶；天不亮就去弄好，天亮开市就好卖了。同时，我们还到码头、火车站上去上货、下货，给人提行李、抱小孩。有时有人赚了钱，特别多给一点，有的阔老没有零钱，就给一张大票子，表示大方。我们到街上倒垃圾，把人家房门口的垃圾箱拉到车上；到饭馆削土豆皮，到旅馆给人家擦皮鞋，夜里就放在房门口，等他们起来，我们已经擦得干干净净了。还到建筑工地做临时工，推砖、搬瓦、扛洋灰、运水合泥；或者打扫工地、清除垃圾，建筑工地很多马车，马到处拉粪，马车走了，我们就把粪收拾在一起，然后装到另外的车上拉走。

不久，我到北部一个原始森林区，战后破坏得厉害的地方去搞清理场地工作一段后，我接到华法教育会转来“雷诺”工厂招考正式工的通知。我等了好久才等到名额，于是我又赶回巴黎去。

“雷诺”是个汽车工厂，在巴黎近郊。周恩来、聂荣臻、

傅钟等都在这里做过工（关于周总理的情况，我写了一个专门材料，最近就会发表，这里就不谈了）。我在国内学过机械，在长辛店又实地操作过，考试这一关并不难过，取录后，我被分配管加工汽车零件，一天六个法郎，合中国一块钱的样子，在巴黎三个法郎就能过一天。因此，可以把挣来的钱，分给别的同学用，那时互相帮助，互相调剂的精神很好，不分什么你的我的，有的或是三个人做工，两个人读书，听说李富春、蔡畅等同志就是这样的。也有一两个懒虫，既不勤工，也不俭学，成天愁眉苦脸，作诗记什么日记，现在那个肖三就是这样人物。

我在“雷诺”工厂干了四个月，做过钳工、旋工、刨工。这个工厂很大，有一万多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这里做工的也不少。但是难得碰头，因为车间多，门也多，一下工就散了。高风、毛羽顺他们也都在这个工厂。

当时，在勤工俭学中，有很多为人称道的人物，如蔡和森，全家都在法国，他的母亲、妹妹（蔡畅）、妻子（向警予）都是勤工俭学学生，王若飞和他的舅父黄齐生老先生也是同在一处勤工俭学。还有徐特立，那时已经四十三岁了，在国内办过多年教育，并在湖南省议会当过副议长，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他也和青年人一样，从头学法文，进五金工厂当学徒，给中国工人做饭、当厨师。他们这种精神，在我们中间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们进工厂，是很不容易的，一不懂语言；二不懂技术。侥幸进了工厂，又有工头歧视排挤。但最坏的是，轻易找不到工厂，没工做，又租不起房子，好多人只好就住在华法教育会，屋里住满了，就在院子里搞帐篷，等着救济。晴天还可以凑合，一下雨就狼狈极了，象一群叫化子似的。这时，法国政府出来干涉，说是碍卫生，李石曾也打官腔，说有辱国体，还

叫警察来赶我们。

也有一部分同学，住在地窖里，自己开火，买不起炊具，就几人共用一套，烧完一锅，再烧一锅，饭烧熟了，就端着盘子站着吃。一方丈面积的地面，煮饭的有好几十人，终日炊烟不断。晚上几十人就睡在地板上，躺下去，休想动一动，翻一下身，需先告诉睡在旁边的人。

吃的是什么呢？是最便宜的豆饼、土豆。因为没有钱买汽油，土豆烧得半生不熟，吃到肚里，不好消化，吃长了，就闹胃病。学生都病倒了，抬进医院，医生也检查不出是什么病，因为法国人没有这个经验，他们不吃生土豆，好多人就这样不明不白死掉了。医院解剖，发现胃里面全是一个个球形的土豆，像是铁疙瘩，抬去一个死一个，弄得人人提心吊胆，怕害病，病了就要死。

正在这个时候，听说北京政府汇来三百万法郎来救济勤工俭学学生，有的人真以为得救了，左等右等，不见华法教育会发放这笔款子。后来才知道他们私人拿去买古董，买马克，做投机生意去了。他们是掩盖真相，又说每人该分多少，还不知道，不好分，等慢慢调查再说。这样一拖又是半年。学生们很气愤，写信去骂，要到法院去告，这才逼得吐出一部分，每人分七百法郎，其余部分都由他们贪污了。

但是，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革命倾向更其鲜明了，蔡和森、王若飞等同志发起组织了“工学互助组”，一边力谋自救；一边从事社会主义的研究。“工学互助组”章程的第一条就是“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不过参加这个组织的学生，政治倾向并不是一致的。

在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有的主张采用无政府主义来改造中国；有的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持后一种主张的蔡和森把他硬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写在纸上，一张一张贴在会场

的四壁，还作了“怎样救中国”的演讲。在他之后，王若飞、向警予、李维汉、罗学瓚、张昆弟、李富春等都发了言，驳斥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争论得很激烈，几至停会。“工学互助组”成立后，无形中成了当时留法学生的领导组织，对学生思想上的进步，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此时，国内压力日紧，华法教育会发出了对勤工俭学断绝经济关系的通告，多数勤工俭学学生被迫得走投无路。“工学互助组”一边在同学中加强思想工作，一边派王若飞等几次向公使馆交涉，都无效果。同学们忍无可忍，一九二一年一月廿七日，“工学互助组”在巴黎一家大咖啡馆里召开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斗争宣言。第二天，一百多个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清早就从郊外赶进巴黎城去，包围了公使馆，派男生代表十人，女生代表一人，去见中国驻法公使陈篆，可是陈篆不让进去，派秘书出来，约大家在公使附近的公园见面。勤工俭学学生都在公园里等着，下午一时，陈篆带着公使馆的职员来了，他的态度是傲慢，什么要求都不能答复，大家火了，连声喊“打！”陈篆着了慌拔腿就走，几个人上去把他的大礼帽打丢了，礼服的领子也给拨弄歪了。靠着法国警察的保护，才逃脱出去。学生被警察驱散了，大家就上华法教育会开会，一致表示要斗争到底，会上蔡和森、向警予还讲了话。这次斗争后，公使馆暗地里酝酿着遣送学生回国的阴谋。在学生中，也开始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倾向无政府主义，一部分则坚决地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工学互助组”也改称“工学世界社”，它的成员由四十多人，发展到三百多人，学生中的爱国进步分子，几乎全被吸收进去了。我们在法国还开展了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政府借款的斗争。一九二一年秋开展了“争回里昂大学”的斗争，这次有104

个同学被押回国了，蔡和森、陈毅等就是这次被押回国的。

最后，谈谈旅欧总支部的情况来结束这个题目。经过几次斗争，留法学生中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是更明白了。同时，陈延年、陈乔年等在巴黎搞了一个书报社，宣传和推销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和国内进步刊物，在同学中的影响也很大。我在远离巴黎的西部读书，快到冬天，高风、毛羽顺来说：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等在巴黎酝酿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SY），问我参加不参加？当然参加，我跑到校长那里，跟他说我要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校长高兴的握着我的手说：“好啊！我们法国也有青年团，你就加入我们的团吧！”我们学校七十多个中国学生，二十多个参加了团组织，另有六个华侨也参加了。

中国旅法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和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一九二二年七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将SY改组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周恩来从德国到巴黎来参加了旅欧总支部的成立大会。会上选出周恩来、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等为委员。

旅欧总支部包括旅法支部、旅德支部、旅比支部。旅法青年团即改组为中共旅法支部。此后，勤工俭学学生参加共产党的就多起来了。总支部机关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哥德伏化街门牌十七号一个小旅馆里，这里住着六七个人，脱离生产专门作党的工作的只有二个人，就是赵世炎和陈延年。总支部出版了一种党内学习和教育性质的刊物，叫做《少年》报，即共产少年的意思，是由陈延年主编的。他每天一刻不停地刻蜡板、油印，别的同志白天去附近工厂做工，晚上回来就帮助他印刷、装订。记得第二期的报上，周恩来还写过一篇论解共产主义常识的论文。

总支部一开始就开展工人运动，很多同志并且参加了法国工会组织的活动；但主要的注意力，还是放在华工方面。比方在